

唐诗研究系列



唐诗传播方式研究

TANGSHI CHUANBO FANGSHI YANJIU

陶涛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唐 诗 研 究 系 列

唐诗传播方式研究

TANGSHI CHUANBO FANGSHI YANJIU

陶 涛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诗传播方式研究/陶涛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7

ISBN 978-7-81110-799-9

I. ①唐… II. ①陶… III. ①唐诗—传播学—研究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30417 号

唐诗传播方式研究

陶涛 著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www.bnupg.com.cn
www.ahupress.com.cn

印 刷: 合肥华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mm×230mm
印 张: 14.5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ISBN 978-7-81110-799-9

责任编辑: 张小伟 马晓波
责任印制: 陈 如 韩 琳

装帧设计: 孟献辉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551-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 0551-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551-5106311

序

唐诗研究者众矣,有考辨诗人诗作文献者,有专论诗人诗风者,有专论文体者,有专论时代文风者,著作汗牛充栋,成果迭出。近年又多另辟蹊径,从诸文化元素之交流入手,探讨唐诗之原生态与魅力,或与政治诸因素之交合探寻诗风文体之演变。唐诗之本来生存状态日益明晰,唐人之生活样态亦日益清楚。近十年之唐诗研究成就大矣。

陶涛此书以传播为视角关注唐诗在唐代之流传过程,角度独特。一般论唐诗之传播者多泛泛而谈,或引一些常见之笔记材料,本书则有深入之发掘。首先厘清了唐诗传播之文化原因:一曰人际交往之密切;二曰教育与科举考试之推动;三曰交通往来之发达;四曰音乐舞蹈之繁荣;五曰统治者之重视与提倡。本书系统研究了唐诗之两个重要传播途径:书写传播与演唱传播。前人虽有论及,然本书较全面深细。资料钩沉之丰富,可谓竭泽而渔矣。当然结构还可更完备,论述还可再深入,个别观点亦可见仁见智。

陶涛家学颇深,其父乃唐代文学研究名家陶新民先生。陶涛原求学浙江传媒学院。2003年自皖入桂,求学于广西师大。我与之共

处三载,指导其研究生阶段之研习。知其性格内敛而实诚,学习执著而有耐力。虽言语不多,而沉于学问中,甚有计划,自得其乐。问其志向,曰有志于传媒,余乃嘱其作唐诗传播,这既与专业不离,又与志向相关。期年,其硕士论文《唐代诗歌传播方式初探》成,众评委咸以为善。毕业后,陶涛供职于中央电视台,其志遂矣。去年予赴京开会,又与陶涛会面,知其负责有关人文栏目,颇有成就,甚为高兴。今年夏天在西安陕西师大召开之古代散文会议上,与其父再度相聚,告曰陶涛硕士论文修改增益,作《唐诗传播方式研究》,拟出版,问序于余,欣然受命。今观该书资料钩稽颇完备,于唐诗传播之途径梳理甚清晰,其中佳处,读者自会有所品味。

是为序。

莫道才

2009年12月26日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引 言	1
第一节 传播的过程和条件	1
第二节 中国古典文学与传播的关系	2
第三节 唐诗传播的概况与特点	11
一、唐代人际交往与唐诗传播	11
二、唐代科举考试与唐诗传播	12
三、唐代交通与唐诗传播	14
四、唐代音乐、舞蹈与唐诗传播	15
五、唐代统治阶级与唐诗传播	16
第二章 唐代诗歌的传播方式(上)	19
第一节 通过书写方式传播	19
一、通过书信寄送的方式传播	21
二、通过编选文集的方式传播	33

三、通过题壁等方式传播	58
四、诗人主动干谒权贵,投献传播自己的作品	96
五、因奇闻逸事而被笔记记录	121
六、通过传奇小说、变文和其他通俗文学传播	134
第三章 唐代诗歌的传播方式(下)	139
第一节 通过游宴酬唱的方式传播	139
第二节 通过国家、地区间的政治文化交流传播	161
一、与新罗的交往	165
二、与日本的交往	168
第三节 唐诗通过演唱、诵读方式传播	171
一、诗与歌曲的关系	174
二、乐工、歌妓对诗歌的传唱	179
三、民间对诗歌的传唱	185
第四节 通过诵读方式传播	190
第四章 唐诗各种传播方式的效果	200
第一节 书写方式的传播效果	202
第二节 演唱方式的传播效果	211
第三节 诵读方式的传播效果	214
第四节 时代因素对诗歌传播的影响	217
结语	221
主要参考文献	223

第一节 传播的过程和条件

“传播”一词是英文“Communication”的汉译,来源于拉丁语“Communis”,具有“公共”、“社区”的含义,逐渐演变成为今天的“传播”、“传递”、“沟通”等意思。传播是人类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信息是传播的前提,传播是信息流动的基础。

所谓“传播过程”,就是信息从传播者流向受传者,实现信息共享的过程,信息的传递与反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实现传播必须具备四个基本的条件,即传播者、信息、媒介、受传者。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完成传播活动。

1. 传播者指传播内容的发送者,是信息传播链条的第一个环节。传播者主要解决“传播什么”和“如何传播”的问题,因此,传播者不仅决定着传播过程的存在与发展,而且决定着信息内容的质量、数量与流向。传播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一个组织。

2. 信息即传播内容。传播本质上就是信息的流通,因此,传播内容是连

接整个传播过程的“桥梁”，只有把信息传播出去，受众接收到信息，传播过程才有意义和效果。

3. 媒介是传播或负载信息的物质实体。传播媒介存在于传播过程的中间，是传播内容的必经之路。离开了传播媒介这一负载、转换、传递内容的具体方式，信息交流就无法实现。

4. 受传者是传播过程的终点，也是传播内容的接收者，它的外延可以涵盖所有的人类社会成员。但是，只有当人们介入到传播过程中，成为媒介的接触者和传播内容的使用者时，他才是严格意义上的受传者。

作为传播过程发起者的传播者在确定了要传播的内容之后，传播者要根据不同的传播媒介特点，把信息转换成为可供传输的符号，即编码。编码与传播者有关，译码与受传者有关。把抽象的内容变成可识别的符号不是随意的，一方面，受传者必须了解传播者使用的符号；另一方面，传播者的传播目的不是符号，而是要传播的思想内容。

传播学中的反馈是指受传者对接受到的讯息的反应或回应，即受传者对传播者的反作用。传播者可以从受传者的反馈中，及时调节和改善传播行为，进行更有效的传播。在传播过程中，反馈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没有反馈的传播是不完整的传播。传播过程不仅仅是起于传播者，止于受传者的单向过程，在实际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和受传者的角色是不断变化的。在信息反馈过程中，受传者变成了传播者，传播者成为受传者。

第二节 中国古典文学与传播的关系

中国文学的起源是与传播同步产生的，由于时代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以及传播者个人具体情况的不同，文学传播的方式和手段呈现为多样化的态势。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方式主要有：教学、传抄、演唱、诵读，其中以教学和书写传抄为主要传播方式。传播目的主要有：政治教化、统治

者考察民意、士人干预政治、抒发情怀、文学价值追求、文化传承等。

在主要以口语媒介为传播方式的上古时代，文字抄写的方式已经产生，但是并不占据主要地位，文学作品的传播还主要依靠的是口耳相传的方式。大量的民歌和贵族的诗篇，就是依靠传唱，然后被官府采诗而保存下来的。《诗经》中的诗歌，在当时都是能演唱的歌词，其中来自民间的歌谣，生动活泼，尤其是“风”，其作者大多是乡村间的民歌手。郑樵说：“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可见它们原本都是要配乐演唱的。

《小雅·巷伯》曰：“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这里的“孟子”不是战国时代儒家代表人物孟轲，“寺人”是古代对宦官的称呼。他原本是个知识分子，因为受到谗言所害而被处以宫刑。《毛诗序》说：“《巷伯》，刺幽王也，寺人伤于谗，故作是诗也。巷伯，奄官兮。”《巷伯》这首诗就是“孟子”抒发其被政治诬陷而受宫刑的怨愤，为讥刺周幽王的昏庸。周幽王和褒姒置国家安危不顾，而“烽火戏诸侯”，导致西周灭亡。《小雅·四月》有：“君子作歌，维以告哀。”用诗歌诉说心中的悲哀。在周代，献给周天子的诗，要经过掌管音乐的官员太师和乐工配乐演唱。贵族之间的献诗，也要经过乐工配乐，汇集于太师之处。春秋时代，孔子整理了中国古《诗》，把它作为教材来教学生，使之流传有序，也对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屈原所写的《九章》、《九歌》等作品也都是可以歌唱的祭祀文学。《楚辞·渔父》中记载：“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屈原被朝廷放逐之后，在江湖间到处游历，他沿着江畔，一边走一边唱着自己的作品。

秦代末期，战乱频仍，大量文字典籍被毁，现今流传下的文学作品只有《水经注·河水》引晋杨泉《物理论》中记载的一首民歌《长城谣》，歌词是：“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明代邱濬的《大学衍义补》里说：“书籍自经秦火之后，固已无复先王盛时之旧。汉兴，多方求之，至哀帝时，刘歆总群书著七略，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古书渐渐出也。”秦始皇焚书之后，《诗》主要是依靠其口耳相传、易于记诵的特点，得以保存并广为流传。文学作品依靠口语媒介流传的事实在汉代典籍中有很多记载，如《汉书·食货志》载：“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其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

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每年的春天，聚居地的百姓将要去田野耕种的时候，采诗的官吏摇着木制的大铃在路上巡视，向过往的百姓采集诗歌民谣，然后把它献给朝廷乐师，配上乐曲，唱给天子听。所以，贤明的君主不深入到民间察看，就可以知道天下的民情。又如《毛诗正义》曰：“国史采众诗时，明其好恶，令瞽蒙歌之。其无作主，皆国史主之，令可歌。”指出周代史官曾参与国家组织的采诗活动，采集到的民歌让瞎眼的歌者演唱，以达到讽喻君主大臣的效果。

汉代人何休在《春秋公羊传解诂·宣公十五年》中写道：“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采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描述了古代的“采诗”制度已很完备，有指定的公职人员专职负责。采集到的诗歌要层层上报，最后交给周天子，使周天子了解民间疾苦，知道天下治理的情况。

书写传播方式的产生时间很早，《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多士》是西周初年，周公把商朝的遗民们迁到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市）周围，向他们转达周成王的命令时写下的。意思是说从殷商传下来的典籍很多，其中记载了成汤灭夏的事件，这些典籍就是现在所说的甲骨文。

以抄写为主的文学传播方式，时间上从上古开始，直到现代，其间主要的书写传播介质经历了龟甲、兽骨→青铜器→石头→简牍→绢帛→纸的演变。

大规模的抄写传播的出现，始于西汉文帝时期。从战国时代起，秦、魏、齐等国都设置了博士官。秦始皇时期，有博士七十人，主要负责礼仪，也参与朝政充当顾问。汉代建立以后，延续了秦代博士旧置，但是人数很少。汉文帝即位后，把博士增设到七十余人，设立《书》、《诗》博士，还设立诸子传记博士，整理抄录先秦失散的典籍，这是自觉的抄录整理，目的是保存和传播文学作品。

汉代出现了“书肆”，即图书流通买卖的市场。这是一个繁荣的自由市场，也是一个文学作品流通传播的场所。西汉文学家扬雄在《法言·吾子》中



说：“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是说应该理解和领会孔子的思想实质，而不能仅是熟悉和爱好孔子的文字章句，否则，就像是书市中陈列和出售书籍的店铺，就像只能敲出小声而不合乎大雅音乐的铃铛。可见，在西汉末年，民间书籍流通十分自由，已经出现了专卖书籍的“书肆”。记录汉代长安城风俗制度的《三辅黄图》中说：“王莽作宰衡时，建弟子舍万区，为博士舍三十区，东为常满色，仓之北为槐市，列槐树数百引为队，无墙屋。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传书记、笙磬乐器，相予买卖，雍容揖让，侃侃诘问，或议论槐下。”南宋人周必大在《文忠集·卷四三》也写道：“君不见，汉京辟雍载《黄图》，博士直舍三十区，分行数百曰槐市，下有诸生讲唐虞。”王莽做大司马录尚书事以后，下令征集天下通晓古今经文及天文、历算、兵法、医学、药学的士人数千人到京师长安，还扩大了太学生的名额。众多士人和太学生的聚集，扩大了对书籍的需求。有一片以槐树为标志的空地，每逢阴历初一、十五，士人和太学生多会于槐树林下，一方面可以进行学术交流，另一方面可以买卖土特产和“经传书记”等物品，场面十分热闹。唐代诗人刘禹锡在《秋萤引》中也说：“槐市诸生夜读书，北窗分明辨鲁鱼。”

《后汉书·王充传》记载了王充在洛阳书肆中读书的事，王充“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王充是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代表作《论衡》八十五篇，是我国思想史上一部重要著作，他的学问恐怕有不少都是在书店里免费阅读时学到的，书肆就这样成就了一代思想家。同样的事例还有东汉的荀悦，《太平御览》卷六一四引司马彪《续汉书》说：“荀悦十二能读《春秋》。贫无书，每至市间阅篇牍，一见多能诵记。”荀悦后来也成为著名的历史学者，撰写的《汉纪》成为汉史研究者必读的名著。

在东汉时期，还有一些家庭贫寒，但擅长书法的人，为了谋生，就代人抄写书籍或自己在家抄好后去市场出售，这些抄书的人被称之为“佣书”人。《后汉书》卷四十七记载班超少年时：“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就是官府雇用的抄书人。抄写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传播行为，抄书的人是传播者同时也是读者，而且往往能够熟读以至能背诵。《三国志》卷五十三《吴书·阚泽传》

记载：“阚泽，字德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所写既毕，诵读亦遍。追师论讲，究览群籍，兼通历数，由是显名。”阚泽是三国时期吴国的大臣，因为他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后来每逢朝廷大议，遇到经典中有疑问的地方，就经常去向他请教。《太平广记》中记载，东汉年间的王溥：“家贫无资，不得仕。乃挟竹简，摇笔洛阳市佣书。为人美形貌，又多文词，僦其书者，丈夫赐其衣冠，妇人遗其金玉。一日之中，衣宝盈车而归。积粟十廩，九族宗亲。莫不仰其衣食。洛阳称为善而富也。”因为他抄的书比较受欢迎，结果积累了一笔不小的财富。

据《晋书·左思传》记载，左思花费十年写成《三都赋》，文章完成之后，没有引起社会的重视，他担心不如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怕被别人非议，就把文章拿给皇甫谧看，请他写序文。当时的名人张载为《三都赋》中的《魏都赋》作注，刘逵为《吴都赋》、《蜀都赋》作注，并且写序文，给予了高度评价，卫权还为《三都赋》作了《略解》。于是豪富之家争相传抄，洛阳纸价因之昂贵，可见其抄录的数量之多，流传范围之广。后世就以“洛阳纸贵”形容别人的著作受人欢迎，广为流传的程度。

“佣书”是诗文传播的重要途径，对文学的发展具有相当大的作用。五代时的牛希济在其《荐士论》一文中描绘唐朝“佣书”的盛况：“当承平之时，卿大夫家召佣书者，给之纸笔之资，日就中书录其所命。每昏暮，亲朋子弟，相与候望，以其升沉，以备于庆贺。除书小者五六幅，大者十有三二幅。每日断长补短，以文以武，不啻三十余人。一岁之内，万有余众。”李休烈任洛阳尉的时候，曾经处理过一起斗殴案件，某“佣书人”被人殴打。李休烈在《对佣书判》中写道：“士生于代，各安其业，或削觚成学，或握槩求工。道既多门，艺非一揆。甲言自巷党，爰居道周，虽殊兰蕙之游，且托桑榆之荫。佣书自给，道有类于班超。”最后给予了打人者以处罚。可见，“佣书人”多是具备一定文化水平，而又社会地位不高的普通民众。《玉台书史》记载，唐代的女书法家吴彩鸾：“以小楷书《唐韵》一部。市五千钱，为糊口计，然不出一日间能抄数十万字，非人力可为也。”数十万字虽有夸张，但也可以看出其抄写速度之快。《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下）记载：“绍宗少勤学，遍览经史，尤工草隶。家贫，常

佣力写佛经以自给，每月自支钱足即止，虽高价盈倍，亦即拒之。”抄书是一件费时费力的工作，所以“佣书人”主要是贫穷的人。唐代的李商隐年轻时家庭贫困，曾经以替人抄写书为生。他在《祭裴氏姐文》中回忆说：“人生穷困，闻见所无。及衣裳外除，旨甘是急。乃占数东甸，佣书贩春。”就是说曾经为人抄写文章和春米贩卖谋生。白居易在《效陶潜体诗十六首》描写了一对“佣书”夫妇的生活：“西舍有贫者，匹妇配匹夫。布裙行赁舂，短褐坐佣书。以此求口食，一饱欣有余。”赞扬了他们尽管贫困，却依旧保持乐观开朗的态度。窦群在《初入谏司喜家室至》中也有对“佣书”的描写：“一旦悲欢见孟光，十年辛苦伴沧浪。不知笔砚缘封事，犹问佣书日几行。”这里引用了东汉孟光的典故，是说虽然家境贫寒，要抄书贴补家用，但是夫妻恩爱，举案齐眉，心里十分满足。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传播，最主要的目的是宣扬伦理道德，以正人伦，维护封建秩序，教化天下百姓。因此历代统治阶级都十分重视，采取各种方式加强其传播的广度与速度。周代设有采诗的专门官员，官名叫做“邶人”或“行人”。他们到民间去，负责搜集各地的乐舞作品。因为乐舞是礼制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这些被记录下来的歌词就是诗。周代卿士大夫的“政治美刺诗”就是《诗经》中的一个重要类别。这一类别又包含“政治颂美诗”和“政治怨刺诗”两类，主要存于《诗经》的“大雅”与“小雅”之中。例如《诗经·大雅·烝民》是一首“政治颂美诗”，着力塑造周宣王时期宰相仲山甫的完美形象，赞美大臣的德、能、勤、绩，立意高远，形象鲜明。《诗经·小雅·正月》是一首“政治怨刺诗”（开头的“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正月指夏历四月），是贵族士大夫们的讽喻劝戒之作，抒发了感时伤乱的忧患意识。士人干预政治、讽喻劝谏，是周代贵族的精神品格在不同政治形势下的表现，由此形成中国文人赋诗言志的传统。《礼记·王制》曰：“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说的是统治者从民谣中了解民情。《小雅·节南山》曰：“家父作诵，以究王讟。”诗人名叫家父，说自己作诗的目的，就是为了追究造成王朝灾祸的人。

郑玄的《毛诗谱》有：“又问曰：‘《小雅》之臣何以独无刺厉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之诗是也。’”《毛诗小序》曰：“《十月之

交》，大夫刺幽王也。”诗人是朝中大臣，以日食对周王进行警告，谴责其任用小人，朝政腐败，反映了在西周末年，由于天灾人祸而引起的尖锐社会矛盾。

《诗经·小雅·雨无正》记载周厉王在位时的旱情说：“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周厉王是一个暴虐昏庸之君，再加上虢公长父和荣夷公的唆使误导。致使本来就已经尖锐化的各种矛盾迅速激化。

《诗经·小雅·小旻》：“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谋犹回遹，何日斯沮。谋臧不从，不臧覆用。我视谋犹，亦孔之邛。滄滄诋诋，亦孔之哀。谋之其臧，则具是违。谋之不臧，则具是依。我视谋犹，伊于胡底。我龟既厌，不我告犹。谋夫孔多，是用不集。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如匪行迈谋，是用不得于道。哀哉为犹，匪先民是程，匪大犹是经。维迓言是听，维迓言是争。如彼筑室于道谋，是用不溃于成。国虽靡止，或圣或否。民虽靡盬，或哲或谋。或肃或艾。如彼泉流，无沦胥以败。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作者批评最高统治者善恶不分，是非不辨；信邪言，亲奸佞，从而造成国家重大决策失误。

《诗经·小雅·菀柳》：“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无自昵焉。俾予靖之，后予极焉。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无自瘵焉。俾予靖之，后予迈焉。有鸟高飞，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诗中讽刺周王暴虐无常、居心叵测，赏罚不公，是非颠倒。

以上记载说明了中国文学自古就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很多作品是用来劝谏、讽喻政治的。孔子搜集整理了《诗》，对《诗》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孔子认为，诗既可以激发意志，观时代风俗，增长知识，又能协调与他人的关系，还可以干预现实、批评社会。从近的方面来说，可以使人懂得如何侍奉父母；从远的方面来说，可以使人懂得如何侍奉君主。强调了《诗》的社会作用。同时，他也很重视文章的辞采。孔子的文学观点体现在《论语》中，他认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意思是说写文章没有文采，就传播不远。孔子认为思想和学问的传播，要靠富有文采的文章，这也反映出孔子的传播意识。孔子很推崇诗，《论语·季氏第十六》中记载他教育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他这种文艺

思想,被儒家后学们在《礼记·经解》中概括为:“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孔子强调诗歌应具有社会价值和道德价值,发挥教化的作用。在表达形式上,提倡“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反对诗歌表达情感的过与不及。唐代孔颖达的《礼记正义》解释说:“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性情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曰:温柔敦厚,诗教也。”就是说诗歌要含蓄委婉、中和得体。

《毛诗序》说:“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易风俗。”意思是说如果要端正得失、惊动天地、感动鬼神,诗歌是最合适的了。先王就是用它来治理夫妇、成就孝敬、敦厚人伦、教化百姓以及移风易俗的。强调了诗歌的道德教化作用,而这个作用是要建立在诗歌广为传播的基础上的,如果仅仅停留在书面上,那么就成为一纸空文。《左传》认为:“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道德被放在文学创作的第一位,可见其重要性。发展至汉代则嬗变为以大赋来歌功颂德,形成“劝百讽一”的大赋传统。这一传统后来发展为以诗歌或者文章指责时弊、反映民生疾苦。如西汉贾谊的《过秦论》、晁错的《论贵粟疏》便是为诤谏其时政而作。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观点,发起了“新乐府运动”,认为文章应该干预政治、劝谏讽喻,反对无病呻吟的文艺,强调政治功能。所以他的《卖炭翁》和《新乐府》等政治讽喻诗,观点鲜明犀利,语言通俗易懂,目的在于使自己的诗歌广为流传,以达到教化、讽喻的目的。唐代柳宗元的《捕蛇者说》中希望“以俟观人风者得之”,用《永某氏之鼠》比喻那些饱食终日的国家蛀虫。由此可见,中国文学作品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始终贯穿于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进程中,而文学作品要发挥其政治作用,前提条件必然要广泛传播。

其次,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传播,还有文人的抒发情怀、自娱与娱人、文学价值追求等目的。曹丕《典论·论文》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这里的“文章”是指奏议、书论、铭诔、诗赋这几类作品,“不托飞驰之

势”是指文学与政治地位无关。曹丕的目的在于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和独特性。曹丕对文学价值的肯定,反映了他的文学创作和传播思想。文学不再是经学的附庸,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此后,嵇康、阮籍等魏晋名士把文学创作作为抒情达意的工具,抒发内心的痛苦和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西晋的陆机更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的命题。陶渊明的《饮酒二十首》自序曰:“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这组诗名为饮酒诗,实为咏怀诗或称“感遇诗”。作者明确说自己写诗只是“自娱”,写好后“聊命故人书之”,开心取乐而已。陶渊明的这类诗歌没有功利性,没有明确的政治指向,只是书写情怀。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评论此诗道:“据序亦是杂诗,直书胸臆,直书即事,借饮酒为题耳,非咏饮酒也。阮公《咏怀》、杜公《秦川杂诗》、退之《秋怀》,皆同此例,即所谓遣兴也。人有兴物生感,而言以遣之,是必有名理名言,奇情奇怀奇句,而后同于著书。不拘一事,不拘一物、一时、一地、一人,悲愉辛苦,杂然而陈,而各有性情,各有本色,各有天怀学识才力,要必各自有其千古,而后为至者也。”“兴物生感”是说诗人的情感思绪由客观世界的事物所引发,诗人性格、文才的多样化,产生了风格形式各异的作品。

文学是文人抒发情怀的重要表现手段,文人寄身于翰墨之中,希望自己所写的作品能够广泛传播、传于后世,能够引起更多读者的共鸣。文学是人的精神结晶,文学是人的价值创造活动的一部分。文学价值的存在和体现,就是揭示人与社会的状态和性质,剖析人性的深刻与复杂,用文字来启迪人们的心灵,在冷静思考中抒发情感,表现美的力量。中国历史上的无数文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文学来抒发情怀、追求文学价值,从而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四库全书》以经、史、子、集分类,其中属于文学的集部所占分量最大,便是一个例证。事实上,现有古代文献只是历史上海量文献的很少遗存,历代散佚的文学作品太多了。

总之,中国古典文学的传播与文学的社会功用以及传播方式息息相关,文学作品只有广为传播,才能实现其价值和意义,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社会